

盲流冲击波

艳 齐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广角镜》丛书

《广角镜》丛书

盲流冲击波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 208 号

《广角镜》丛书编委会

主 编：姚 望 王海平
常务副主编：鲁 勇
副 主 编：肖 培 张效廉 张成水
编 委：佟丽鹃 古越仁 杨小平
郭宏滨 田科武 张学军

《广角镜》丛书
盲流冲击波

编 著 者	艳 齐
出版发行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原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数 0,001—8,000册
字 数	152 千字 印 张 7.5
版 本	1993 年 10 月 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1039-074-0/G·68
定 价	5.50 元

不仅仅写给青年…

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伴随着经济建设速度的提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全社会：

——思想认识大飞跃，社会观念大更新，“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凝聚人们奋进开拓的思想旗帜；

全社会：

——对内对外大开放，第三产业大开发，经营机制大转换，挺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进军正在全面展开。

全方位的历史变革遍及社会各行各业，多视角的观念更新走入千家万户。我们置身于这开拓的时代，我们创造在跨世纪的新时期。

社会的发展需要人们自觉的投入，社会的前行更需要人们沿着健康的轨道大胆开拓。当我们为今日中国创举之辉煌而高歌，为时代奋进而再接再厉之时，我们也坦诚地看到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林林总总既有积极向上、催人奋发的主流大势，也有由碧微痕、不尽人意的潜流小曲。正像怒吼奔腾的江河水，既冲洗着河床、荡涤着污泥河垢，有时也将岸边的禾苗、树木冲毁……

《广角镜》丛书正是面对社会这一现实，为处在变革时期的人们提供看待社会的各个方面而编发的。本丛书力求展示给人们变革发展时期社会的青春风采，也力求揭示各种有碍于我们目标实现的现象警醒人们。本丛书的各位作者都是长期从事新闻工作、颇有建树的新闻工作者，希望它们的努力为您提供把握现实的新视角。如果《广角镜》丛书能对社会的健康发展起到有益的作用，那将是我们的最大心愿。

由于社会发展变化较快，加之我们认识社会的水平有限，书中如有不正确的地方敬请读者指正。

《广角镜》丛书编委会

1993年3月

目 录

(1)	登峰造极后并未收敛
(4)	必然性之所在
(10)	应运而生的地下劳务市场
(19)	令人生厌的乞丐帮
(22)	疯狂的窃贼与凶残的盗匪
(32)	难以自拔的关键所在
(41)	温顺的羔羊与恣肆的狼
(56)	恶欲疯长于天性的荒芜
(61)	她说：我就做他的小老婆
(68)	都市里的村庄
(74)	绝路逢生的编外市民
(91)	鬼市与众鬼生相图
(109)	心之天平上的一个砝码
(118)	破烂王国的崛起与伴生物

- | | |
|---------|--------------|
| (123) | 金钱使一些人忘乎所以 |
| (134) | 童工现象 |
| (141) | 忍辱负重的雇工生活 |
| (148) | 雇主的马前卒或别动队 |
| (166) | “物”及“物”的相互倾轧 |
| (178) | 一个女盲流的际遇 |
| (217) | 各有不同的最终抉择 |
| (227) | 社会学家的提示及可行性 |

登峰造极后并未收敛

在中国，不论是古老的还是年轻的城市，在广袤的大地上正如同瀚海中仪态万千的岛屿。而近年来这些随改革开放不再安然自得的岛屿在躁动中又持续地遇到了一种不曾预料的冲击。……武昌火车站在不安地骚动！重庆火车站在痛苦地挣扎！北京、郑州、成都、贵阳……等等火车站也全都在呻吟、呼救！近千万农民从广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四川等省区农村涌出，从而形成一股难以遏制的盲流大军，扑向本来就十分衰弱的铁路，使之难以承受了！

——这是1989年4月18日《人民公安报》在4版头条发出的一则消息——

……2月13日，全国整个铁路发送旅客达到408.5万人次，突破了建国以来的400万大关。这时候，铁路运能与运量的矛盾达到顶峰。虽然铁路部门尽了最大的努力，仍然无法满足继续猛增的客流。一时间，全国铁路各个车站纷纷告

急，各次列车在始发站就因超员发出警告和求助电报。武昌火车站每天滞留旅客数已过万人。重庆火车站每天发送旅客过5万人，站前广场，如潮的旅客中，携包带箱的出川农民旅客在80%以上。他们大多是结伴而行，多则数百人，少则七八人。2月17日，绵阳火车站发送旅客达1.5万人，高出日均客流量的2倍以上。成都火车站旅客爆满，发送旅客达5.3万人，滞留旅客仍有5万多人。中国铁路的咽喉地郑州火车站同样在喘息，广场被农民挤得水泄不通。2月18日，重庆铁路分局的客流量达15.6万人。襄渝线的广安、渠县、达县等火车站发送旅客均过1万人，超过平日客流量的10倍，每站积压旅客过5千人。据铁路有关部门统计，在40天的春运中，全国铁路发送旅客6407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351.9万人次，并在固定列车比去年同期增加36对的基础上，又增开临时旅客列车5938列，是铁路客运史上增开临客最多的一年。

而实质上，铁路对于盲流只不过属于一种中介，因为他们的目的所向是城市。《法制日报》曾为此惊呼：许多城市的市政交通、城市供应受到极大的压力，治安、刑事案件在上升！

是的，盲流现象就是在这一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的。它由几年前的为人们所忽略变得令人瞠目。人们当然无法否认，随着改革的深化，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投向城市，使城乡经济交流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蓬勃发展。这种交流是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一件好事，也是为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史证明的一种必须趋势。然而，中国又是一个以农村为主的人口大国，如果不考虑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城市的承受能力，听

任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则会打扰城市的经济、社会秩序，也给农村和农业自身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患。因此，该年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地方和铁路共同采取措施，严格控制农民盲目外流，应该说是十分必要的应急之举。

只是，时至今日，这股盲流潮并未见收敛。

1992年9月13日，在岳阳奔广州的315次列车上，我又亲眼目睹了山洪般扑向广东的“川军”。所有车厢都挤得沙丁鱼罐头一般，以至行李架上都躺上了人！他们当中既有青壮年男子，又有妙龄少女，更有顶秃鬓花的老弱者。用他们的话说，他们是到广州下苦力。据说，他们当地正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他们还大多是有组织的，身上揣有乡政府出具的务工证明。他们临行前，许多乡长、村长还跟他们一起喝了饯行酒。他们还都是义无反顾，大有不混出人样儿来，不回去见家人的架式。跟我挤在一条座椅上的两女一男还不时又搂又亲又说又笑，全不见长途跋涉的倦怠。似乎等待他们的是实实在在的天堂。

必然性之所在

盲流大军之所以能形成并绵延至今而不溃，是有其必然性的。

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农民摆脱了原有体制的束缚，确立了其作为商品生产者的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就是说，现在的农村已经失去了任何可以继续约束农民不得离开土地的机制。与此同时，一些率先在城里找到工作的农民获得的令人羡慕的收入却愈发强烈地吸引着在家种地的农民。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增长，土地家庭承包后效益的增加，以隐蔽状态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公开化了。据有关部门介绍，目前，我国农村的劳动力是3.9亿。每个劳动力的人均耕地是3亩7分。按现实情况，一个劳动力可耕作15亩地，以此推算，农村只需1亿劳动力就足够了，剩下的近3亿劳动力，即使有近一半人已被乡镇企业及林、牧副业吸收，也仍有1亿多劳动力被闲置。在这一切背景下，既然投身非农

产业已经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做的事，且可由此取得高于务农的收入，为什么大家还要拥挤在狭小的土地上呢？于是，到大中城市里去闯荡，成了众多农民的一致选择。或者说，这叫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到尽头的反弹。

《经济日报》于1989年3月17日就此发表署名文章进一步指出——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村土地一直作为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稳压器”在发挥作用。为了发挥就业“稳压器”功能，农民不断在压低基本生活品需求方面作出让步，有些地方甚至连基本生存条件都难以保证。农村改革使这一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为农民参与工业化进程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使乡镇企业能够异军突起，很快发展起来，成为近年来农民参与非农就业的主要载体。但尽管如此，10年来乡镇企业也只吸纳了农村新增劳动力的84%，其余相当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有通过其它途径来寻找到就业机会。而近年来经济紧缩波及到乡镇企业，银行信用社贷款压缩、重要生产资料由政府有关部门专营、能源短缺，这些因素普遍抑制了一些乡镇企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原来同乡镇企业有产品加工合同的一些城市企业因本身不景气，纷纷取消了定货合同，甚至应付给乡镇企业的总额达上百亿元的加工费或购货款也拖欠不还，使这些乡镇企业的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也就助长了农民走出农村到城市寻找乐土。

然而，他们的出走又确实带有明显的盲目性。因为他们并不真正清楚等待他们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他们只看到一些人到大中城市如鱼得水，却不知对于步其后尘的他们，到城市是很难堆出笑脸的。今天的城市正处于产业结构需要

调整的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不仅不可能增加农民新的就业机会，而且原有的民工还要有相当一批人需返回农村去。即使城市经济发展了，也不可能迅速形成大规模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因为城市基础设施累积问题极多，资本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城市本身达到就业年龄的人口增长正进入到一个高峰时期，城市职工“铁饭碗”制度并没有完全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的农民要想在城市站住脚决非易事。

只是他们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盲流。他们无不抱有明确的目的。他们也都十分自信，他们相信自己在各个方面都不劣于他们群落中的先行者，他们更相信城市肯定会成为他们左右逢源的天下。他们渴望金钱，并要在城里挣到金钱以改变命运，实现自我。

是的，金钱这个能够使人堕落又能够让人荣华的妖艳的天使从远古至今以她那充满魅力的舞姿倾倒了多少名家义士！对于世代匍匐于乡土的农民，她的头上更闪有异常诱人的光环。获取她，永远也没有满足的时候，这似乎是上帝赋予人的本性。改革，把城市大门打开，又正好使追求者们发现了一条通向理想的捷径。

“从黄土地里一辈子也刨不出金砖。”脊背佝偻的老者在向他的子孙说。

而他的子孙何尝不想一跃成为金钱最中意的情人？

不过，具体到每一个加入到盲流大军的个体，他们在拥有一个总目标的同时，又都分别具有各自独特的面孔。这也正像同一片水域，不同的波面有着不同的折光。

新华社记者焦然、赵鹏曾记有这样一篇采访录——

正月十五刚过，记者来到北京站，看到站前广场、车站

售票厅和旅客候车室内，挤满了携带大包小包的农民。有人给了他们一个别致的称呼，叫“包袱队”。

在站前广场上，记者与四川广元苍溪乡的青年农民朱华德、卞国军攀谈起来。

问：“你俩准备到哪儿？”

答：“到沈阳去找活。”

“你们出来，家里的地谁去种？”

“家里一人只几分地，没啥子可干。出来还能挣点钱。”

记者又访问了两个背着花包袱的姑娘。

记者问：“你们也来找活干？”

小A有点羞赧地答：“我们是出来玩的。有活我们也干，带的钱都快花光了。”

小B说：“我们来北京好几天了，就在车站过夜。”

或坐或躺在大小包袱上的农民，多半都显出疲困之色。

四川垫江县金华乡农民龙昌禄说：“我家3口人，只种1亩2分地。现在化肥、饲料都涨价，种不起地，养不起猪，不出来，拿啥子混日头！”

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

城市绮丽的风光、摩天的大楼、川流不息的车潮，与他们所处的天地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这种反差中，他们发觉了自己身价的卑微。在遥远的梦里，他们就曾把自己打扮成威武的王子或华贵的少妇。他们也可谓是觉醒的一代。他们后悔自己投胎时选错了地方；他们怨恨父辈为什么甘于贫穷。一个诗人曾这样描绘他们：“望着前人不肯翻越的山峰/他的心头垒满了岩石。”现在，他们意识到抛开这些“石头”的机会已经到来。他们不能像前人那样优柔寡断。冲破阻挡自己的

樊篱，彩虹会架起通天的桥梁。怎么还能一辈子跟土坷垃打交道呢？他们要自己开创出一番事业，取得父辈仰慕的地位。于是，他们来了。他们在踏出出走的第一步时就想好了，他们最起码要在城里装满他们的钱袋。他们太不满于在农村“没啥子可干”的日子了，太不满于“种不起地，养不起猪”的生活了。他们要自己证明自己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不是孬种，以往没有的，自己能“挣”来！

而对于那些家境贫寒，温饱无着者来说，出走更是出于对命运的逃避。这部分人当中不少人又都未成年。“自己养活自己”，是他们神圣的口号。一个15岁的安徽小姑娘告诉我，她是弃学而来的。不是她不想上学，而是当地的学校收费之高使她的家庭无力承受。她底下还有两个弟弟，母亲早已去世，3张嘴全依仗父亲一个人靠打铁喂养，穷得1条被子3人盖。看到父亲拿着要交的学费攥出了汗，她哭了。她请求父亲别再为她为难了。她一咬牙，和村里的几个大姑娘结伴乘上了进京的火车。

当然，也确有“出来玩的。”但他们的“玩”与城里人余暇时游山玩水是不同的。如果他们的经济实力足以支撑在城市的消费，他们是无需夹杂于盲流大军内四处奔波的。正是因为他们“带的钱快花光了”、“有活也干”。他们的玩不无苦涩。是的，城市对于边远乡村的农民是充满诱惑的。像京城，街有前门、王府井、大栅栏，景有八达岭、香山、颐和园，对许多人来讲，不亲眼一睹，称得上枉来一世。只是真正富起来又舍得花钱的农民在整个农村人口比例上所占比例并不大，大多数农民还处于一块钱纸币也得掂量着花的境地。但对任何人来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无法泯灭。当在谋求新

的生路的同时有望实现“玩”的梦，他们不再犹豫了。他们的出走，也可谓同样是出于对自己现有境遇的抗争。他们要活得像个人一样！而这个人正是以城市居民为可比物的。他们妒嫉城市居民普遍的优越的生活条件。而要实现心理上的平衡，他们也就只能告别乡土，到城市来，在挣钱的同时来满足那种精神需要。

于是，“包袱队”出现了！于是，盲流大军汹涌地还在盲流！

应运而生的地下劳务市场

的确，城市曾是十分热情地欢迎这些远离故土的农民的，并且，至今就全国范围来讲，建筑、纺织等城市产业的生产一线，一直保持着近 1000 万人的“农民工”。昔日的农民已占这些产业生产一线工人的 40~50%，不少企业达 70~80%，个别工种达 90% 以上。国家劳动部、建设部和众多企业领导可以说都有着如此的共识：如果没有这些农民来城里做工，许多企业的生产会陷入瘫痪。

记者王宏铭曾记述道——

北京国棉一厂目前有 1300 名农民合同工。1990 年春节的一场大雪，使家住延庆、密云、怀柔等北京远郊县和河北易县的 600 多名农民合同工不能按时返京上班，厂长邸长明急得寝食不安。原因很简单，这些农民工都已成为生产骨干，离开她们生产就无法进行。为了按时开工，工厂的大小汽车一辆辆冒雪出城了，接回了 100 多名家住平原乡的工人；他